

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蒙博托总统

对蒙博托总统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会见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 会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



毛主席和蒙博托总统热烈握手。



毛主席会见蒙博托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中将。

当蒙博托总统在外交和国际合作事务国务委员恩古扎·卡尔·伊邦德、共和国总统府主要顾问莫科洛·瓦·姆庞博陪同下来到会客厅时,毛主席同他及其随行人员热烈

握手。蒙博托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你表示敬意。毛主席对蒙博托总统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会见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

会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齐宗华、罗旭、唐闻生等工作人员。

董代主席周总理致电金日成主席金一总理深切哀悼郑准泽同志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一月十三日打电报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金一同志,对郑准泽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唁电全文如下:

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金一同志: 惊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中央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郑准泽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我们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郑准泽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中、柬两国政府关于一九七三年中国无偿供应柬埔寨军事装备物资协定和中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协定在京签字

宾努首相、英·萨利特使和李先念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关于一九七三年中国无偿供应柬埔寨军事装备物资协定和中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协定签字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席签字仪式。

代表中国政府在两个协定上签字的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代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分别在两个协定上签字的是军需军备大臣杨森安将军、财经大臣秀木。

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首相府大臣吉春,外交第二副大臣万比尼;

我国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有关方面负责人范化冰、乔培新、梁枫、高建中,以及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

签字以后,中、柬两国政府领导人举杯,共祝中、柬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图为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军需军备大臣杨森安将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一九七三年中国无偿供应柬埔寨军事装备物资协定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

去年十一月中旬，我们在安庆、芜湖两地区和马鞍山等地访问。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大开脑筋。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思想中又有进一步的体会。用一句话来概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干劲，出现一片大好形势。

形势发展超过预计

一年的工农业发展基本定局的时候，同志们都在算一番账，情况是一年比一年更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带来了又一个胜利。

安庆地区粮食亩产连年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去年全区亩产超过前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个曾经是钢铁缺铜的地方，人们正在全力投入采煤、开矿、炼铁、建设电站的战斗，为新的跃进准备条件。

芜湖地区，这个全国有名的米乡，去年全区亩产达到八百四十斤，超过《纲要》。猪的发展很快，达到一户两头半以上。芜湖地区铁的生产达到年产五万吨以上，用铁基本自给，生产了农村急需的机械，仅柴油机一项去年已超过三千台。

有着悠久采矿历史的铜陵，现在已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这是宋朝诗人形容当时的开矿情景。解放前，矿山受到严重破坏。现在铜陵市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一个历史新局面。去年，矿石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主要有色金属产品，提前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质量一直保持一级品。

长江南岸的钢铁城市马鞍山，这个城市的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日夜奋战，胜利地建起了一座拥有采矿、炼铁、炼钢和轧材的现代化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一九七二年钢和钢材分别提前四十五天和三十五天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

形势发展超过人们的预定计划，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提醒人们，要看到批修整风在广大群众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使自己思想、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要落在后边。拿当涂县来说，原来预计晚稻单产四百斤，上场后，从粮食入库的数量看，平均亩产远远超过预计的四百斤，成了安徽省又一个超千斤县。形势发展得这样快，决定性的因素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人心，精神变成了物质。

用党的路线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

革命形势好，很重要的一条是各级党委成立后，抓紧抓好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提高了老干部和新干部路线斗争觉悟，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些地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仅解放了干部，安排了适当职务，更重要的是在批修整风中，把老干部和新干部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做到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带领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

芜湖地区区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原副专员林德江，正确接受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提高为党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就是一个例子。

林德江今年五十九岁，参加革命三十年，长期在芜湖地区分管农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批判，一度

革命干劲是怎样来的——记芜湖安庆等地的大好形势

想“图清闲”。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林德江接受历史教训，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不断端正自己的思想，从而精神抖擞，发挥了一个干部应有的作用。

有意见，要不要提？要提。但一定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用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去提。一九六九年七八月间，芜湖地区水位上升，形势危急。林德江被派到防汛指挥部工作。他看到当时的部署在抗洪方面有不足之处。想到一九五四年芜湖地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洪防汛的经验，认为应当迎着洪水干，不然就有被大水淹没的危险。要不要提意见呢？开始他有顾虑，后来想到赶在洪水前头去抗洪是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斗争经验，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便向领导上提出了“发动群众，到长江口抗洪”的建议。这个意见一提出，受到领导上的坚决支持，让他到最危险地段指挥。经过群众的抗洪斗争，终于在洪水水位高达十一厘米七米的险情下，确保芜湖地区的安全。通过这件事，林德江认识到，凡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意见，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精神面貌从此改变。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的事，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接受教训，从路线上分清是非。一九七〇年，林德江在当涂县发现有不少农民没有养猪，他调查养猪减少的原因，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农民给队上交猪粪不分工，政策不落实。林德江认为积肥分工是符合党的政策规定的。有人说：“你又谈分工了，还不接受挨批判的教训”林德江说：“过去犯错误不是因为分工分，而是因为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使养猪事业走了邪路。”他征求了贫下中农的意见，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建议开一个养猪工作会议。地区领导积极支持这个意见，召开了一个有公社以上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关于养猪工作的政策和技术问题，写了会议纪要。近两年全区养猪事业迅速发展，去年达到《纲要》指标。林德江认识到，领导干部应当随时随地取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坚持在路线上分清是非，积极主动对党负责。他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向群众学习，做调查，主动解决问题。”

对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所必需的机构和制度，应当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建立起来。一九七〇年九月，芜湖地区水稻发生了小面积病株，减产三亿斤粮食。林德江组织干部向群众作了调查研究，发现植物保护机构和制度十分重要。它是同病虫害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他把群众的想法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在党组织支持下，召开了一个专业会议，健全了各级植物保护机构，建立了制度，安排了植保人员。一九七一年虽然九十天大旱，由于预防虫害做得及时，仍然夺得丰收。

芜湖地区在落实干部政策上还有以下几点：一、全区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解放了并分配了工作。八个县，有六个县的第一把手是由有多年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在地区和县的领导机构中，保持了相当数量的原在本地长期工作的干部。二、注意培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放手让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三、老干部支持新干部，新干部尊重老干部，新老同志并肩前进。四、第一把手勇于承担责任，支持新老干部工作，充分发挥干部的作用。

加强农村广播网的管理

不够重视。有的公社或大队的广播站只管放大电，不管线路通不通，喇叭响不响；有的大队或生产队乱接电线，把电线缠在树上，风一刮电线被扯断；有的把电线搭在墙头上，一遇下雨，电线短路，造成喇叭不响；有些线路不注意检查，长期失修。这些情况造成广播喇叭时响时停，影响了群众收听广播。

不要随便开广播会

随着农村广播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县大部分公社都建立了广播站，这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办好广播，本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可是，有的基层领导同志却随意召开广播会议，一开就是一、两个钟头。有时为了开广播会方便，把重要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挤掉了，对此群众有意见。

乱开广播会并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我县师古公社党委书记早在早稻治虫时，根据虫情测报点掌握的情况，决定狠抓一下治虫。那天晚上，他们足开了两个钟头的广播会，满以为这样做好，下面会动起来。结果，第二天下去一检查，没有多少人去治虫，有的队的农药还在供销社里放着没发回。经了解，听到广播的人并不多，有的虽然听到了，但思想上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口夺粮，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即把各大队的负责同志都找来，在田边开了个现场虫情分析会。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领大

几个地方有一条共同的经验：要在批修整风中用党的路线教育干部，提高觉悟，依靠群众，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新老干部的作用充分发挥了，那里领导班子就能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就能迅猛发展。

按照总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些地区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的决定因素。它激发了干部、群众极大的革命干劲，高高举起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大旗，加大步子，勇往迈进。

鼓干劲，干部要带头到群众中去做好工作。芜湖地区有个化肥厂，工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请第一把手进第二道门。二道门就是工厂的车间。这个问题提得好。有不少领导干部天天只在一道门内开会，不大进二道门。各地党委为了改变这种思想作风，带头按照党的总路线抓生产，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

第一把手是否应当抓生产？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第一把手是政治领导，抓生产就成了“生产第一”。中共铜陵市委的第一把手的体会是，他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只抓政治，不分管生产。结果，政治起不到统帅的作用，生产上不去。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他到生产第一线，感到生产斗争中也有政治。这位同志在铜官山矿最艰苦的松树山火区蹲点，虚心向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集中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智慧，同时也钻研专业书籍，调查研究，摸清矿山建设的情况。他用总路线的精神带领群众大打矿山之仗。从此，有色金属的生产年年大幅度增长。为了制定一九七二年的生产计划，他跑到各大矿山调查研究，根据矿山生产的特点，正确处理采掘关系，使掘进总量创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好水平。

马钢第二轧钢厂党委书记王天九在小型轧钢车间蹲点，用党的路线教育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干劲。他边劳动，边向群众学习，查阅和分析了十多年的生产原始记录，亲自参加绘制设备和工艺改革的图纸，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奋战，改革成功小型钢材的轧制工艺，使轧机生产能力提高近一倍。王天九同志用总路线的精神推动生产斗争，能叫业务挂帅吗？不能，应当说，这才是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

要鼓革命干劲，就要敢于抵制一些不符合党的路线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芜湖机床厂革委会主任孙树真就是这个厂的老厂长，文化大革命中，市委决定他要继续担任第一把手。他注意发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当时，有人对于要不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不要尽可能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有一些疑虑。市委书记及时向工人同志指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才能调动积极因素，应当坚持下去。这个工厂四十六名技术人员回到技术工作岗位，使产品质量很快有了提高。在党的总路线鼓舞下，孙树真领导工人、技术人员搞技术革新，制造国家急需的重型机床。他几天几夜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奋战。人们都叫他“铁老头子”。这个厂有一千四百多职工，多数人他都能喊得出

名字。孙树真带领职工奋斗的结果，两年来实现大小革新一百多项，制成十四米单臂刨床，高七米、重一百一十吨的落地镗床等六种重型设备。有几种产品销到国外。不久前，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把这个普通机床厂，改名为芜湖

重型机床厂。

就是工作基础好，生产有较大发展的地方也还有一个认清大好形势，执行总路线，继续鼓干劲的问题。

桐城县在一九六五年粮食亩产超过《纲要》后，就在亩产八百斤上踏步，不再前进。领导干部也喊着蹲点，就是蹲不住。后来地委常委搬到桐城来开，叫县委把桐城和江苏省的先进县比，和湖北省的先进县比，和昔阳县比。这时才发现桐城县虽然上了《纲要》，但全县还有占三分之二耕地面积的产量低的小丘地区，在桐城有平均亩产一千七百斤的公社，也有平均亩产四百来斤的公社。县委的同志接受干部和群众的批评，带领大批干部到产量低的地方蹲点劳动，终于在去年使全县粮食亩产量超过了千斤。

鼓实劲，不图虚名

鼓革命干劲，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是鼓实劲还是鼓虚劲，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中共芜湖地委提供了一个鼓实劲，不图虚名的例子。前年芜湖地区下面自报的粮食数字是平均每亩七百九十五斤，差五斤没有达到《纲要》。有的人认为下面报的保守，实际产量比报的多，要求复查或再打一场场。地委拒绝了这些建议，认为如果粮食多了，放在群众手里，那是藏粮于民。再打一场粮食就要失信于民。地委的同志说，我们不是为超《纲要》而超《纲要》，要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国家多做贡献。地委这种正确的思想和做法影响很大。群众看到领导上充分信任群众，从而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去年全区亩产以较大的增产幅度超过了《纲要》。

鼓干劲，必须坚持多快好省，全面安排，不搞片面。

有的地方为了多打粮食超《纲要》，就忽略了山区林业建设，不适当地开了荒地。粮食一时可能增产，但是山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受到影响。中共太湖县委书记赵杰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背着背包进山，那里山多大，那里偏僻条件差，他就到那里去了解情况。他用十三个功夫，把太湖县的四百多个生产大队大部分都跑到了。他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总结了过去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林木受到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瘠薄的教训。他和县委书记同志一起，坚决贯彻执行山区建设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分别不同情况把山封了起来，结果，发展了多种经济，全县粮食产量并没有因之降低。粮食亩产还是超了《纲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批判，激发了干部、群众极大的革命干劲。他们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指示，提出加大社会主义建设步子，为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非常及时的。当然，任务是艰巨的，在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矛盾。高产地区也有低产，平衡中也有不平衡，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坚定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一定能够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做到好上加好。

本报记者

工矿企业要搞业余体育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许多工矿企业开展了群众性的业余体育活动，对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对抓革命、促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应该提倡。

但是，也有一些单位在搞体育活动中，抽出一些人来，长期脱离生产岗位，外出进行比赛，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倾向，应该纠正。

我们厂曾有一段时间，把足球队员抽出来，白天进行训练，晚上外出比赛，不参加生产，造成了一些关键工序没人操作，影响了生产。对此，工人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批修整风中，厂党委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发展体育运动的指示，以车间为单位，发动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篮球、排球、乒乓球、拔河等体育活动，既丰富了工人的生活，增强了工人的体质，又促进了生产，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欢迎。

我们希望各工矿企业，要坚持开展群众性的业余体育活动，反对脱产搞体育的错误倾向，更好地搞好工业生产。

广西大钢厂工人 华红

我们爱看折子戏

我们爱看折子戏，折子戏就是排演了很长时间的剧目，在演出中，演员们经过多次排练，已经非常熟练，观众看了以后，感到非常满意。折子戏在戏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折子戏中，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将一个个生动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戏曲的魅力。折子戏的演出，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业余生活，也为演员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在折子戏的排练过程中，演员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看到自己的作品最终呈现在舞台上，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折子戏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重视农村广播人员的培训工作

我们是边远山区县。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近几年来，全县已建立了十二个公社一级广播站和一百一十四四个大队一级转播站，自架广播专线三千七百二十四公里，安设喇叭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三只，平均每个农户就有三个喇叭。百分之九十七的生产队都通了广播。但是有段时间由于没有抓好农村广播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不少社队的喇叭和广播机坏了找不到人修理，有的社员只好赶两三天山路拿到县城去修理，既影响生产，又妨碍正常的广播。这个问题引起了县委的重视，立即采取措施，由县广播站负责进行技术指导 and 培训工作。两年

来，全县采用分期办学习班和分批跟班学习的方法，先后对农村基层广播人员培训了一百四十多人次。现在全县十二个公社广播站的广播人员都基本掌握了广播器材的安装和修理技术，能够迅速地对广播站进行日常维护，保证了农村广播的正常进行，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我们认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对基层广播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为农村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技术队伍，更好地发挥农村广播的作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以及好人好事。

广西田林县革委会

宣传组



依靠工人群众 不断挖掘企业内部潜力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钢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超过设计能力

据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坚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不断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最近三年连续向前跨了三大步，钢产量超过设计能力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七〇年超过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七一年超过百分之五十；一九七二年超过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国家计划。三年来，这个厂的产品品种增加，质量稳定提高，原材料消耗也有所降低。

首钢炼钢厂是一九五八年开始兴建的，是我国第一个采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的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厂的基本建设和生产速度进展都比较缓慢。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职工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革命步步深入，钢产量逐年上升，一九六九年的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这个水平离设计能力还差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一基础上，国家要求这个厂一九七〇年进一步增产，超过设计能力。

如何完成这个新的生产任务？一些人认为，炉龄低，要经常停炉检修，不能保证“三吹二”（即三个炉子不能保证经常有两个正常炼钢），因而必须增加设备，新建一个炉子，“以四保二”。另一些人则认为，正是因为炉龄低影响了“三吹二”，只要千方百计提高炉龄，减少停炉检修的次数，就能做到三个炉子经常有两个正常炼钢。这些主张挖掘潜力的人们用这个厂的转炉炉龄曾经有一次达到过四百六十八炉的事实，说明炉龄可以提高，有潜力可挖。他们说，四百多炉虽然只出现过一次，看起来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只要认真摸索它的规律，就能改变炉龄低的状态，突破现在的生产水平，超过设计能力。

真理愈辩愈明，道理愈讲愈清。大讨论使全厂职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也明确了挖掘潜力的方向。一个努力提高炉龄，挖掘潜力的群众运动，很快便在全厂开展起来。打砖工人在炼钢工人密切配合下，经过近百次试验，增强了炉衬耐钢水冲刷的能力，为提高炉龄提供了有利条件。炉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改革单孔喷枪，采用了三孔喷枪新技术，又解决了炉口容易掉砖和炉内局部地方容易损坏的问题，使炉龄大为提高。这样，炉龄就由上半年的平均二百多炉提高到四百多炉，最高达到五百多炉，提前完成了一九七〇年全年生产任务。钢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点九。

一九七〇年取得的新成绩，使许多人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新的启发，决心继续挖掘潜力，在新的一年里再创新的纪录。过去，这个厂曾进行过扩大转炉装入量的试验，但是由于钢水包、天车和锭型等设备不适应没有成功。这次，经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们正确地吸取过去扩大装入量试验的教训，利用停炉中修的时间，反复实验研究，改革了钢包，加固了天车，改造了锭型，结果使每炉钢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与此同时，他们还继续猛攻炉龄关，使炉龄进一步提高，突破了七百零八炉，一九七一年全年平均炉龄达到五百三十一炉，创造了我国转炉炉龄的先进水平。这一年，这个厂的生产，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首钢炼钢厂连续两年创造炼钢生产的新水平，使厂党委和革委会成员得到了一个深

刻的启示：只有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挖掘企业潜力。进入一九七二年以后，厂党委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厂党委在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发挥老工人的骨干作用，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选拔到领导岗位，组织领导生产，把大部分老工人放到生产第一线担任班组长，直接加强炼钢第一线的领导和生产指挥。这个厂还认真对青年工人进行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教育，引导青年工人为革命学技术，举办技术训练班，组织老工人在炉前进行技术操作表演，使青年工人的操作水平迅速提高。

党的政策的落实，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挖掘了企业潜力。去年，原计划要停产半个月进行设备检修。结果由于修理速度加快，保证了“三吹二”的正常进行，没有影响炼钢时间。炼一炉钢的辅助时间也由原来十一分多钟缩短到八分多钟，为多炼钢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为了更好地挖掘潜力，厂党委还注意教育职工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前年第四季度，有的人单纯强调调“大装入量、大氧压、大出钢口”，结果欲速不达，不但没有多产钢，还影响了质量。去年，他们对这种“三大”的做法进行科学分析，经过反复试验，找到恰当的比例，实现了稳产高产，提高了钢的质量，使钢的生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全厂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认真总结经验，决心在一九七三年继续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夺取新的胜利。

李先念李水清周化民会见林纳莫部长和由他率领的芬兰政府工商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水清，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今天上午会见了芬兰外贸部长尤

西·林纳莫和夫人，以及由林纳莫部长率领的芬兰政府工商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尼乌斯参加了会见。参加会见的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王本祚、杨阳、彭金波、张剑飞、高立兴、李宝城等。

芬兰驻中国大使海莱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芬兰政府工商代表团离京去外地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芬兰外贸部长尤西·林纳莫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芬兰政府工商代表团结束在北京的参观访问，由一机部副部长张剑飞陪同，今天下午乘飞机前往上海、广州进行参观访问。

周化民，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本祚、彭金波、杨阳、郑志坚、张精甫、张星桥等前往机场欢送。芬兰驻中国大使海莱尼乌斯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今天中午，李水清部长设宴招待了林纳莫部长等芬兰贵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日本滑冰联盟等组织签署会谈纪要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董念黎、孙平化，同日本滑冰联盟副会長堀忠雄、理事仓町太郎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长村冈久平，在十一日和十二日就发展中日两国滑冰界的交往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并于今天下午签署了会谈纪要。

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认为，发展中日两国滑冰界的交流是符合两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的。为了推动中日两国滑冰界的良好来往，日本方面，日本滑冰联盟将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合作；中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将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

签字仪式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体委负责人李青川会见了日本朋友，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日本朋友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一月十日到北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日本冰球联盟等组织签署会谈纪要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董念黎、孙平化，同日本冰球联盟常务理事鬼鞍弘起、山添义雄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长村冈久平，在十一日和十二日就发展中日两国冰球界的交往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并于今天下午签署了会谈纪要。

会谈纪要指出，为了发展中日两国冰球界的良好往来，日本方面，日本冰球联盟将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合

作；中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将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双方认为，推动中日两国冰球界的来往，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签字仪式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体委负责人李青川会见了日本朋友，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日本朋友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一月十日到北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日本羽毛球协会等组织签署会谈纪要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郭雷、孙平化，同日本羽毛球协会理事长川端祥市、常务理事菊地利明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长村冈久平，在十一日和十二日就积极开展中日两国羽毛球界的交往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并于今天下午签署了会谈纪要。

会谈纪要说，日本羽毛球协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是代表中国羽毛球界的唯一全国性协会。据此，日本羽毛球协会认为有必要谋求解决中

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在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正当权利，并将为此作出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对此表示赞赏。双方认为，为了推动中日两国羽毛球界的良好来往，日本方面，日本羽毛球协会将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合作；中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将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

签字仪式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体委负责人李青川会见了日本朋友，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日本朋友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一月十日到北京的。

首都新闻界举行酒会

欢迎随同蒙博托总统访问的扎伊尔新闻界人士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中国首都新闻界今晚举行酒会，欢迎随同蒙博托总统访问中国的扎伊尔新闻界人士。

《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在酒会上祝酒，他代表中国首都新闻界人士对扎伊尔新闻界人士访问中国表示热烈欢迎，并祝中扎两国人民和新闻界人士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扎伊尔报社负责人协会主席兼《光明报》（周刊）负责人、社长哈米西·波约·基贝比亚第二接着致词，他代表随同蒙博托总统来中国访问的扎伊尔新闻界人士感谢中国新闻界人士所给予的热情接待。

首都新闻界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尚、金照、王珍、朱显松、严寒、师海云、徐惟诚、吴国英、兰子安、汪溪、孟吉青等出席了酒会。

杨驥副會長設宴

欢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一行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对外友协会长杨驥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一行。

有关方面负责人刘庆棠、孙平化、林林、刁克

源，以及首都文艺界代表出席宴会作陪。清水正夫一行是为准

备在日本演出中国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十一日到达北京的。在今

晚的宴会上，杨驥副会长和清水正夫团长先后讲话，祝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祝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加强。席间，两国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罗马尼亚艺术家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由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歌剧院舞蹈大师瓦西里·马尔库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和文化委员会芭蕾舞和歌剧考察组，结束了对我国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有关方面负责人王良池、仇良、章亮，以及首都文艺工作者前往机场欢送。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格夫列希也到机场送行。

罗马尼亚朋友在中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参观了京剧、中央乐团等文艺团体，访问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学校，和中国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流了创作经验。当考察组十一月十一日访问中国舞剧院时，舞剧院的同志亲切地接待了罗马尼亚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舞剧院在罗马尼亚访问期间，受到罗马尼亚文艺工作者的热情接

加纳驻中国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加纳救国委员会执政一周年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加纳驻中国大使理查德·马·阿克韦和夫人，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庆祝加纳救国委员会执政一周年。

我国外经部部长方毅，农林部部长沙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中国人

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政府其他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陈慕华、于桑、陈维祺、谢华、李大同、丁西林、周培源、缪海校、王寿仁、周荣国、方肇、王海廷、王浩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乔冠华会见埃及《金字塔报》董事长兼主编海卡尔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今天下午会见埃及《金字塔报》董事长兼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及其随行人员阿卜杜拉·阿卜杜尔·巴里、穆罕默德·优素福·艾哈

迈德、哈姆迪·福阿德、穆罕默德·赛义德、艾哈迈德、萨米赫·福阿德、萨迪克和吉马尔·阿卜杜勒-阿齐兹·马塔尔，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埃及驻中国大

使阿卜德也在座。参加会见的有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朱启祜以及江承宗、李松龄、沈若芸、胡凤仙等。

会见后，乔冠华副部长设便宴招待埃及朋友。

新华社长沙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电 以阮文贝为团长的越南南方青年解放联合会代表团，结束了在湖南的友好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开长沙去桂林。

代表团是一月十日乘飞机从广州到达长沙的。当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军举行宴会热情欢迎越南南方战友。在洋溢着热情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李振军副主任和阮文贝团长先后讲话，共祝中越两国人民和青年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发展。

十三日下午，长沙市青年八百多人隆重集会欢迎越南南方战友。会上，代表团团员阮氏青菊、胡团心分别介绍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受到热烈欢迎。到会青年对越南南方战友的抗美援朝斗争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越南南方战友在湖南期间，曾到韶山参观访问，受到韶山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明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越南南方战友在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毛主席旧居陈列馆。

越南南方战友在湖南还参观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水塘、爱晚亭、桔子洲头和工厂，观看了湖南省文艺工作者演出的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

越南南方战友到达和离开长沙时，李振军副主任等负责人和长沙市青年二百多人前往迎送。

越南南方青年解放联合会代表团结束在湖南的友好访问去桂林

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

苏 习

一九六二年，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唯恐天下不乱，从各个领域掩护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周扬一伙在这样的时刻抛出“现实主义深化”论，正是妄图割和对抗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现实主义深化”论要求文艺创作反映两个“矛盾”：一曰：“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即所谓“内部矛盾”；二曰：“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从旧到新的“苦难历程”，“痛苦心理”，即所谓“内心矛盾”。周扬一伙动员作家集中笔力“深化”这两个“矛盾”，并告诉人们：沿着这两个“矛盾”去“深化”，就能获得“现实主义的胜利”。

然而，我们只需用党的基本路线剖析一下这两个“矛盾”，就不难发现它们大都是“深化”论究竟要把社会主义文艺引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呢？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宣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作家们应该赶快掉转笔锋，向内部矛盾“深化”。

轻飘飘的一个“内部矛盾”，“化”掉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矛盾，“化”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

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去反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去揭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

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还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还有什么“现实主义”可“深化”呢？在今天，文艺既要深刻反映现实，就不能离开体现现实生活主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使以“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材，也必须以这一斗争为纲。这是因为，反映在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都渗透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都与现实生活中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其实，周扬一伙所要“深化”的“内部矛盾”，决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他们笔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昏庸无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被领导”却“精明强悍”。尽管如此，周扬一伙还嫌这样的作品不够“愤怒”，鼓动一些人拿起“铁笔”，向无产阶级进攻。一时间，文艺界黑云压城，妖风四起，那些反党的“顶风人物”破门而出。

除了写这样的“内部矛盾”，周扬一伙还鼓励作家去刻画人物的所谓“内心矛盾”。他们为我们勾划了一种内心“丰富复杂”、思想“痛苦阴暗”、积压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并为这种“人”加了一个定义，曰：“中间人物”。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所谓“内心矛盾”，不能不是社会阶级斗争在人们内心的反映。

在今天，反映在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的“内心矛盾”，无论怎样“丰富复杂”，总不能超越现实生活中两大对抗阶级的精神状态：一个是闪烁着时代精神光芒的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一个是充满着破灭之感的没落阶级的“内心矛盾”。至于那些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要向两极分化的。其中绝大多数总是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他们有一个思想改造过程，但绝不是什么“在清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他们在思想改造中会产生痛苦，但绝不是什么“内心分裂”、“悲苦”、“绝望”，那种以“阴暗”、“绝望”为特征的所谓“中间人物”，只能是行将灭亡的阶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周扬一伙用怎样含糊抽象的概念或怎样“丰富复杂”的词汇，都掩盖不了这批“中间人物”臀部上的鲜明的阶级印记。

要问什么是周扬一伙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吗？把“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愤怒”地揭露出来；把没落阶级的心声“复杂”地反映出来。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我们的文艺如果照此办理，按这两个“矛盾”去“深化”，那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一幅惨淡的图景，一个卑琐的“大千世界”。无产阶级叱咤风云的斗争现实还有没有呢？没有了。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宏伟远景还有没有呢？没有了。这种“深化”，从根本上“化”掉了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反映社会矛盾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美化，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丑化。其结果，社会主义文艺必然被“深化”到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道路上去。

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就是以反映“两重人格”、“精神分裂”、“内心矛盾”为其特征的。这个为周扬一伙顶礼膜拜的“有毒的天才”，当时站在没落资产阶级立场上，借“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小人物”之口，毫无掩饰地发泄了那种“卖掉整个世界而换得一个歌”的绝望、阴暗心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周扬一伙狂热地拾外国死人的牙慧，在艺术上正如列宁所说的：“对最拙劣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在政治上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总是与政治战线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周扬一伙在延安发动的“暴露文学”，作了一次周扬发动的“反运动的内应”；五十年代，周扬一伙提出“不粉饰现实”的“写真实”论，作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先锋；六十年代初，周扬一伙又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号下，大写了“痛苦”、“复杂”、“绝望”所谓社会制度的“阴暗面”，成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前卒。

纵观几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我们可以发现，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总是借助政治上的谎言，文艺上的丑化，来歪曲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他们把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描绘成“天怒人怨”、“一团漆黑”，好象社会主义之舟即将“覆沉”了。这种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的丑化和颠倒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毛主席一

见便错了感错了，也还要这样。这就是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就是党性。写自己相信的东西，即使犯错误也值得。”

这段话说明白一点就是：作者“所见”、“所感”、“所信”的便是“真实”的。“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就是“忠实于”作家自己“所见”、“所感”、“所信”的东西。

用作者自己“所见”、“所感”、“所信”的东西观察一切、衡量一切，然后决定建树什么和诋毁什么，这不是货真价实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赤裸裸的唯我论又是什么？然而，这正是周扬一伙信奉的“党性”。

这种货色，我们似曾相识。胡风宣扬“主观战时精神”，宣扬“自我扩张”，不也美其名曰：“主观和客观吻合”？

瞿白音宣扬唯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不也专门加了一个注解：“作家、艺术家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这个“自己”是“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表现出个人的好恶和主观的任意性”？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偷运唯心主义的黑货，这就是周扬、胡风一伙的骗子手法。

名曰“忠实于客观事物”，实则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即忠实于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妄图“忠实”地按照这个资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我们的党，这就是周扬一伙的全部“党性”。

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从政治上击中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要害，“使伏在大厦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曾几何时，刘少奇、周扬一伙连同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文艺纲领，统统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席卷而去了。

在我们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后，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又作为它的另一个极端的补充出现了。这种“无冲突”论妄图把人们引到云雾迷漫的“无差别境界”。我们有些同志也不敢写矛盾冲突，恰好说明还没有从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艺术观的高度，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理论划清界限。

“现实主义深化”论、“无冲突”论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的反映，都源于反动的唯心史观。他们有时也讲“矛盾”，但矢口否认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本质的是阶级矛盾；他们有时也写“冲突”，但一笔抹去文艺作品中矛盾冲突的阶级内容。这种唯心的历史观、艺术观，与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党的基本路线最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的阶级实质，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就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提炼生活，概括矛盾，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会主义现实的革命本质；就要要求作家把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始终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主导地位，在典型的矛盾冲突中完美地展现英雄人物内心的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生命线，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灵魂。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文艺创作的典型化、理想化就成了一句空话。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破坏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在阉割这条生命线，扼杀这个革命灵魂着手的。

“现实主义深化”论从出笼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表明：我们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领域可以不同，形式可以变换，但斗争的中心始终只有一个，这就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奏用”。我们一定要记取这十年的斗争经验，用战斗来保卫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周扬一伙曾把他们提倡的文学称之为“动人”文学。他们标榜的“动人”的方法，则是“借重评论家，论题简短来动人的”，是用“人”来“动人”的。

周扬一伙精心塑造的“动人”的“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也不象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一群“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千百年来阶级斗争史和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阶级为了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总是塑造本阶级的“理想人物”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三纲五常”，塑造了他们理想中的“忠臣孝子”；资产阶级为了开拓自己的“金钱世界”，塑造了他们理想中的“征服者”，“具有个人奋斗精神的人”；无产阶级为了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也塑造了本阶级的英雄典型，展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有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想人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所谓“以小见大”，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现象抓本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一个小册子里，不仅看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的严重教训”，而且由这本书的感染力考虑到作者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的重要性，他热烈称赞这本书是“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图画”。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们，也正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把最普遍、最普通的工农兵实际生活进行提炼，并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作品。《红楼梦》、《龙江颂》、《沙家浜》，通过一个异姓三代的工人家庭、一个普通的生产大队、一支新四军伤病员组成的小

分队，反映了气壮山河的主题，就是三个“以小见大”的极好说明。周扬一伙的“大小”观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另一些“以小见大”，反映了他们所谓的“平平凡凡”究竟是指什么呢？只要看看他们所欣赏的《三里湾》就晓得了。这本小说通篇是讲什么波乱起伏男人的“诀窍”，就长雇工走私的秘密，她如同公婆闹分家的风波、令娘干涉儿女婚事的曲折，这个据说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三里湾”，分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小吴淞湾！

原来，周扬一伙就是这样在写“平平凡凡”的幌子下，故意歪曲现实生活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到明暗角落里搜罗一些鸡毛蒜皮琐屑节任意夸大，以逞其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的。如果说，这些专写不平和一般反党的“一粒米”、“一粒米”那么，它不折不扣是一粒发霉的“米”，不管他们怎么吹嘘的“忠实于生活”、“深化”了现实，“一粒霉”、“一粒霉”所反映的，只能是地、资产阶级腐朽的“细菌世界”。

让周扬一伙接着那粒霉透了的“米”，抱着那套写“平平凡凡”的谬论，到他们那个“大千世界”见鬼去吧！

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更加鲜艳地引导着我们的文艺创作向着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世界前进！

要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

甘 戈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才能深刻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真实，揭示出生活发展的革命真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使命和革命现实的发展要求，向无产阶级文艺提出的最先、最科学、最正确的创作方法。

周扬等四条汉子，为了把文艺变成他们“干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反革命工具，鼓吹“写真实”，提倡“现实主义深化”论，叫嚷要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因此，他们拚命反对毛主席倡导的艺术方法，反对塑造体现无产阶级理想的英雄人物，反对用革命理想去鼓舞人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与此同时，他们又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大肆宣扬文艺作品可以不根据现实生活而人为地“拔高主题”，竭力鼓吹离开现实生活“的高空作业”，似乎不要来源于生活也可以凭“热情”写出所谓非常政治化、调子很高昂的作品。其目的，也是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艺术方法，动摇这个艺术方法的革命现

实主义根基。

周扬等四条汉子把现实和理想割裂开来，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偷换了革命的辩证法。我们主张描写理想，但这理想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的理想，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辩证地历史地观察现实，去描写现实的革命发展。否则，那就不能反映出现实的真实，而且还会歪曲革命的理想。

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为我们很好运用毛主席倡导的艺术方法作出了范例。它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同现实的革命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用革命理想指导对革命现实的描绘，用对革命现实准确、鲜明、生动、真实的描绘，去体现灿烂的理想光辉。我们应该继续批判周扬一伙鼓吹的“现实主义深化”论，认真地划清“写真实”论同艺术反映生活本质的界限，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实践，努力创作出既能体现革命理想，又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亲切感人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

所谓“劝人”文学

梁 溪

这些阶级塑造的不同的“理想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有一定阶级的代表人物，典型人物，他们身上都凝聚着一定阶级的理想、愿望、欲望。

然而周扬一伙塑造的“芸芸众生”，却闪闪掩掩，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身上专了资产阶级的烙印。这些人究竟是哪个阶级的“理想人物”，为哪个阶级“劝人”呢？

打开“劝人”文学，看一看周扬一伙笔下那一群“芸芸众生”，无一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而实质上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无一是徘徊于党的领导和自暴自弃力之间的，而实质上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人。周扬一伙一面给这些人戴上工农群众的外衣，戴上“中间人物”的面具，一面又象牧师一样“劝人”同情这些人，给这些

人“大多数”的位置。既要反党，又要伪装，可见他们用心之苦了。

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企图用他们的浑身散发铜臭的代表人物来作为“劝人”的标本，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来腐蚀人们的灵魂，已经很难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专了资产阶级的政，无产阶级光辉灿烂的英雄形象也在文艺舞台上专了资产阶级“大少爷”、“纨太子”的政。周扬一伙再要通过文艺来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不能不乔装打扮一番，给魔鬼披上人皮，给毒药裹上糖衣，以便“上和和平”地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甜甜蜜蜜”地腐蚀人的灵魂，偷偷地实现其夺权、杀人、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所谓的“中间人物”，则正是实行他们这种反革命策略的“理想人物”。周扬一伙用这种“人”“劝人”，这就更见他们的恶毒用心了。

周扬一伙的“党性”

魏 山

一向反对文学党性原则的周扬，一九六二年竟侈谈党性来了，而且还概括成了一句名言妙语：“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就是党性。”

说严格点，这还够不上称为“新”概括、“新”发明。翻翻周扬以前的讲话，就可以找到：

“艺术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是生活之真实的描写”。（一九四五年）

“生活描写的真实性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原则”。（一九五三年）

“作家首先要反映真实……”（一九五六年）

“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六一年）

一连串的“忠实”加一连串的“真实”，简直比唯物主义还唯物主义。

可是，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上，那些声嘶力竭叫喊“真正国货”、“货真价实”、“廉价拍卖”的人，往往是骗子。同样，文学史上那些贴着“写真实”一类商标的作品，往往是不折不扣的骗人文学。

周扬一伙不也是口口声声说：“不粉饰现实”，“不漠视生活的真面目”吗？可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无一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恶意丑化的大毒草。

就是在周扬一伙鼓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那次会议上，周扬说：

“作者应该根据自己所感到、所见到的写，即

